

新地文學叢書

荊棘中的探索

尉天聰著



荊棘中的探索

尉天聰 著

新地大學叢書

新地文學叢書 14

荆棘中的探索

作者：尉天聰

發行人：崔紀彥

出版者：新地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木柵郵政一—二六七信箱

電話：三九四—四八五四

郵政撥：〇七一四五七六一四崔紀彥帳戶

總經理：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486號2樓

電話：三九四四八五四

印刷廠：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第三二七六號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定價 一〇〇元

紀念唐文標

爲了中國，

我們會一次又一次的悲憤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灰心！

新地文學叢書小引

誰沒有夢呢？

據說，人和禽獸相異的地方不多，人會做夢，便是其中之一。人類的夢，既複雜，又繽紛；尤其是在目前的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奇離的虛幻的夢。

我們的夢却單純而古老。

我們的夢，單純——我們只想尋求一片文學的淨土。我們的夢，古老——我們相信：在文學的土地上，應該有寧靜的和平，有豐盈的愛。

在文學的土地上：可以歌，可以泣，可以細語情話，可以慷慨陳辭，可以留連無邊的風月，可以抗滾千古憂國憂時，可以關心人間疾苦與廣大羣衆共呼吸……文學的土地，廣袤而無所不包，可以生長任何的夢想；但是，所有的夢想，都應該從真情熱愛產生。要是沒有真情和熱愛，怎能有文學的美？要是沒有真情和熱愛，

文學，又算是什麼？

我們尋求這片文學的夢境。在這多風多雨多煙塵的島嶼，我們尋尋覓覓，展開在眼前的三十多年的文學景象，讓我們不能不失望！不能不憤慨！

三十多年的臺灣文學，製造的，也是夢境！讓人永遠長不大的夢境，讓人虛浮空幻的夢境。

人，應該隨着青春的流逝而長大；我們的民族，應該背着苦難的傷痕而長大。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偉大的遠景。讓大家的夢，美麗而健康地綻開。

在文學的土地上，我們的夢，單純而古老。我們的夢，就像「文季」文學雜誌第一期「發刊的話」所寫的：

我們熱愛文學，認為文學不僅是藝術也是人生的重要事業。

我們感到，需要一塊超然的文學園地，來供海內外文學朋友們耕耘。

我們要繼承中國優良的文學歷史，給後來者留下一條應走的道路。

這就是我們刊行「新地文學叢書」的目的。「新地」是文學的新地，我們將以

真情和熱愛來耕耘它。

序

收在這裏的文章，是我近五年左右面對中國現實所生的感想，因為是感想，當然其中的一些意見也就不能算做成熟的結論。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感想，大概有感於三件事：

一、近百年來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下，真是像處在荊棘之中，在這困境之中，雖然隨時會遭到挫敗，但爲了民族的前途，我們不能不堅忍地探索下去，否則只有等待滅亡。

二、今天，除了極少數人士以外，大概沒有人反對民族主義，但是，在臺灣，我們却看到一種現象，那就是：一些人雖然講說民族主義，却在講說民族主義中忘掉自己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忘掉帝國主義；甚至不但忘掉帝國主義，而且還宣揚一

種「在帝國主義保護下的民族主義」；這就使我們的民族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

三、中國以往的分裂是自己的問題，今天，中國的分裂則是國際強權下的產物，所以，不認清帝國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的種種伎倆；不認清當權者及所謂的學術界與帝國主義互相利用之事實，則國人就看不出應走的方向。

基於這些，我寫下這些感想。現在把它們集中起來紀念亡友唐文標逝世的週年。

一九八六年五年

不能用美麗的教條掩蓋赤裸裸的事實！

近幾個多月以來，中共的《中國青年》雜誌展開了一個名為《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討論，這是由一封青年女工的信引發出來的。這個女工名叫潘曉，二十三歲，父母和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從少年時代就執著地相信「人活着，就是爲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應該有一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但是，經過十年動亂以來所走過的艱難歷程以後，她的人生却由希望、失望而至於絕望的地步；她苦悶、掙扎、徬徨而又找不到出路；她不願走向虛無，却又感嘆「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於是，在極度矛盾之下，她寫信給《中國青年》雜誌，希望透過這封信的發表，能從全國廣大的青年中得到幫助。

這封信發表以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甚至中共中央書記、國家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也發表了關心的談話。雖然，這些話說得也很漂亮，但它能產生多少好的效果，仍然不能不讓人充滿懷疑。

爲甚麼要這樣說呢？因爲潘曉所面臨的問題，固然有普遍的一面，也有它特殊的一面。所謂普遍的一面，那就是各個時代、各個社會，由於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宇宙的大生命與個人的小生命……之不能配合，甚至因種種原因而發生激烈之衝突和差距，由是而產生的失落和苦悶。這些不但是一些文學家、藝術家不斷感慨、唏噓、悲傷、流涕之所在，也是衆多哲學家、宗教家爲之尋求原因、探索出路的主題和事實。潘曉，生而爲人，特別因爲她是女人，當然會有她女性的敏感和做人的矛盾與苦悶；但是，通過她的自白，我們發現她的苦悶、掙扎、徬徨而又找不到出路，並不僅僅是一個像曾經發生在別的時代、別的社會的問題。更重要的，它還有個別的特殊的一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所帶給她的信仰上的危機。也就是說，潘曉等人大多是懷抱着濃厚的理想的，但是，無數中國人民悲慘的境遇和相對於它的中共黨中普遍的官僚特權作風，却使他們漸漸體認出：自己以往

所執着的那些教條並不是真理，相反的，在赤裸裸的事實對照下，那些從中共教育中取得的信仰便一變而為迷信和偏見。這不僅是潘曉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是新五四運動到楊曦光、李一哲、魏京生、傅月華……廣大青年的共同轉變和反抗的事實。而那些不能與此相適應的官方言論與所謂的法律保障等等，便必然地成為維持既得利益的屠刀。大陸地下刊物《四五論壇》上所刊登的一段話，就是最好的證明，它說：

有一些慎重而好心的人告訴大家：「所謂言論自由，只存在民主牆前，萬不要在單位或其它熟識的地方使用，要牢記五七年『引蛇出洞』的歷史教訓，不要忘記『反革命』的帽子，否則現在所講的話就等於存入銀行，運動一到，連本帶利都有。」

但也有一些初生之犢者，憤慨激昂的反駁說：「怕什麼！憲法給了我們言論的自由。」

好心人緩緩穩重的回答：「請別忘了，憲法上還有一條，而且在你的言論

自由的前面，那就是鎮壓一切反革命的活動。」

仔細一想歷史，又確乎如此。爲了搞清這個問題，便借了一本憲法，詳細的看了一遍，確實只看到「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通過回憶……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這一公民的權利，便變成了毫無實際意義的空話。因爲什麼是「反革命的言論」是很難確定的，只能憑各級長官和司法大員的認識來定，而各級長官和司法大員的識別能力，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歷史證明，這一條「反革命的言論」即「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憲法」曾經產生過何等的冤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怎樣的浩劫：向黨交心者，被戴帽子，打棍子；大鳴大放者，成爲右派，發配邊野勞改……。在這樣的淫威下，晝夜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在歌功頌德聲中，生產下降，供應緊張，人民貧困……

這就是廣大的中國青年被屠殺、欺騙的事實；而另一些青年則在愚民政策下被閹割得「甚麼也不思，甚麼也不想」，一天拖過一天地麻木下去。巴金說過：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危機便是民族的虛無主義；而其產生的基礎正是民族的大挫敗；要解

除這種危機，首先必須嚴肅地正視產生這種虛無的歷史事實，亦即徹底了解到是甚麼思想、甚麼制度、甚麼樣的病根造成如此不幸的局面。不正視歷史的事實，不肯勇敢地面對現實、嚴肅地檢討自己的錯誤，不把產生這種不幸的根本原因揭發出來，就無法建立新的理想，開拓新的人生道路，到最後也就無法把握任何真正的人生意義。這是歷來有關人生意義之討論最後淪於空洞討論，不了了之的原因所在。

有了這種認識，我們不能不對胡喬木和中共的《中國青年》雜誌，以及中共官方的傳播機構感到失望。胡喬木是中共的老幹部，又是現階段的一位領導人物，他應該比誰都了解今天中國青年苦悶、彷徨的社會因素，不肯面對潘曉這樣優秀的共產黨員的先揭發產生中國青年苦悶、彷徨的社會因素，不肯面對潘曉這樣優秀的共產黨員的子弟老老實實地承認共產黨人的錯誤，而只擺出「大師」的姿態，說些漂亮的門面話，這是有意地逃避現實。事實上，人生的意義能否獲得，青年們能否真的建立新的目標，絕不是紙上討論的「答案」是否滿足，而是在實踐上能否真的阻止以往那種錯誤事件的發生，亦即：能否阻止再有屠殺、閹割、欺騙、玩弄青年的事實出現。中共當局一面宣揚建立民主生活，一面又關閉民主牆、取消四大自由、大捕民

主人士，而且不准人民辦報結社；一面高談青年苦悶，一面又不肯追究產生這些苦悶的因素，則所謂討論也者，只不過一場新的玩弄青年的文字遊戲而已。

這場遊戲是怎樣的呢？

那就是企圖以看來熱鬧的文字討論，來掩蓋赤裸裸的事實。這必須追溯到文化大革命。魏京生說過：

文化革命這個名詞很恰當，因為引起這場革命的原因純粹是屬於精神世界的。是多年被壓抑的憤怒之爆發，也是傳統意識和傳統思想方法與現實事物不協調的產物。文革時期，凡是爆發鬭爭的單位，從中央各部門到農村大隊，幾乎都是過去被壓迫的羣衆反對曾壓迫了他們的領導人。這場動亂實在是共產黨暴政多年來的積弊所造成。

而潘曉之對人生感到失望、苦悶，也是從文革開始的。不僅如此。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中共所統治的現實社會仍然一再挫傷着她：「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

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她需要朋友，但「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在這種處處充滿小流氓的特務作風下，她把一切投注在愛情上面，結果愛情又欺騙了她。在一個處處宣揚社會主義溫情的社會裏，却使人得出「人都是自私的」結論。這些實在都是中共冷酷統治下的赤裸裸事實，也是引發從新五四、反右……到四五天門事件一連串反抗的背景。這些赤裸裸的事實是中共官僚集團所最感到恐懼，也知道是無法遮蓋得住的。在如此情況之下，他們只有轉移目標，用全黨全軍之熱烈却抽象的討論，來掩蓋赤裸裸的事實，以玩弄青年反抗暴政的努力。

中共《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者的話」說：

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

很明顯的，他們是想發起一場學術的討論來輓化青年的反抗，想以抽象的、玄學的遊戲來掩蓋三十年來中共所製造出來的悲慘現實。而中共官方的傳播機構的一些話，更可作爲補證。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七日中共新華社在報導有關這場討論時說：「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問題上：一、什麼是科學的革命人生觀？二、怎樣認識和對待我們的現實社會？」而所觸及的都是抽象的言詞，而未及於血的事實，甚至在結尾時還說：「有的青年說，我們常喜歡說『看透了』，其實我們對真正看透了人世間的馬列主義，連ABC還不懂。我們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武裝自己。有的青年說，感謝深沈的人民羣衆的海洋。在人民母親的懷抱裏，我們汲取了勇氣和力量。……」這種黨八股所宣揚的只不過又一次支持中共的「四大堅持」而已，根本連中國當代青年之苦悶、絕望之所在，毫毛也沒有碰到一根，如此，要解決青年問題、要真正認識到人生的意義，豈非痴人說夢！

自古以來，中國青年屢次在現實中遭到打擊和挫敗，也多次地能够由挫敗中再一次站起，唯有那種「清談」式的討論不但沒有帶給人希望，反而對於希望的追尋，產生輓化的作用，東漢黨錮之禍到魏晉的清談，便是最有力的證明。青年的問

題、人生的意義之所以發生，都是從赤裸裸的現實中產生的，因此，它必須用赤裸裸的現實的改造來解決它——美麗的教條是永遠掩蓋不了這些赤裸裸的事實的！

一九八〇年十月